

熱潮

第六期要目

- | | |
|---|---------------|
| 1 | 由反日到反國民黨 |
| 2 | 關外義軍英勇抗日的意義 |
| 3 | 哈爾濱白俄暴動與其幕後陰謀 |
| 4 | 擠他們到後台去！ |
| 5 | 上海商人對於罷市的態度 |
| 6 | 公債？ |
| 7 | 時事短評 |

石 南冠 復初

每星期六出版
零售：每册四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在編者：熱潮週刊社

上海福州路合翠坊三二零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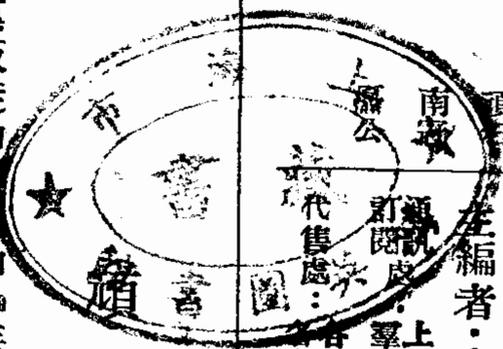
代售處：各報局

由反日到反國民黨

學生運動走出了『只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

調動國家所養的百餘萬軍隊之權在國民黨政府手裏，正式徵收賦稅以供軍餉之權也在國民黨政府手裏，管理全國兵工廠之權也在國民黨政府手裏，代表國家宣戰講和之權也在國民黨政府手裏，其他一切高居人民之上的權力機關：警察，法院，監獄，也都在國民黨政府手裏；如果真要實行反日而不是說空話，必然要利用這些物質的力量才行，決不是貼貼標語和打打通電可以濟事的。

自九一八日軍侵入國境以來，國民黨政府不用牠手裏的一個軍隊去抵抗日軍，而用之鎮壓反日民衆，屠殺愛國學生和『勦赤』；不用牠手裏的賦稅收入儲爲對日戰爭的軍餉和接濟反日的軍隊（如馬占山的軍隊），而用做開他們黨的大會、豢養鷹犬（如在上海漢口等處，除地方偵緝機關外，由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直接遍設窮治敵黨的偵探



石

機關和豢養敵黨叛徒的機關如『蘇俄評論社』和『光明之路社』等等），以及個人的肥私與濫費（例如蔣介石購自用飛機一架花了二十八萬元）；不用牠手裏的軍器武裝民衆（對上海等處的學生義勇軍不發一槍一彈），而用做擴充個人私有的軍隊（例如擴充蔣系的憲兵以牽制陳銘樞的軍隊）；不用牠手裏代表國家的權力對日絕交宣戰，而用以向國聯乞憐和準備向日本訂城下之盟；不用牠手裏的警察，法院，監獄，以懲辦親日賣國的官僚奸商和逃將，而用以逮捕審判拘禁愛國學生，日貨檢查員以及革命的工人與青年。

以上這些事實有如白日經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見，叫真心要反日救國的人民，如何能夠『只問外交不問內政』，如何能够只做反日運動而不反對國民黨政府！

不但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政府是客觀的必然，無論人們願意不願意這樣做；並且，反國民黨運動之發展必

然和反日運動之發展成爲正比例。民衆反國民黨運動發展之前途，亦將與國民黨鎮壓反日運動互爲因果，因爲國民黨愈看透了反日運動與反國民黨運動之連環性，牠愈要鎮壓反日運動，牠愈鎮壓，民衆愈要反對牠。

或者有人認爲這兩個運動開始時雖然有牠的連環性，未必長久都會連環的繼續發展下去；因爲國民黨既然看清了這兩個運動的連環性，牠使會自解其連環，即停止鎮壓反日運動，代以努力領導反日運動，則反國民黨運動和反日運動，還會並行的存在嗎？

這僅是形式的假定，而不是實際。國民黨不能自解這兩個運動之連環性，是受了歷史的社會的經濟的條件之限制。

今天已是二十世紀之三十年代了，國際帝國主義已壟斷了全世界的筵席，到來得太晚了，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夠有德意志和日本資產階級那樣的幸運，由牠在推翻舊的封建統治鬥爭中，組織成牠自己的武力和政權來統一國家而使之對外獨立自主，得以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發展國民經濟。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的鴻運，最可能是太平洋戰爭時代，其次便是李鴻章時代，最後而已經難能是經過中日戰爭後的戊戌維新時代，其後更經過辛丑條約，牠已經沒有這樣的運命了。辛丑條約是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築成了堅固的堡壘；非衝破這一堡壘，所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與統一』，『國民經濟自由發展』，都是不可能的事。這一堡壘，不是某一個獨立的國家對於某一個獨立的國家之關係，簡直是國際帝國主義對於公共殖民地之關係，同時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對於宗主國之關係；所以中

國民族衝破這一堡壘的鬥爭，已化爲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民衆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之一部分，即世界社會革命鬥爭之一部分，不能夠像前世紀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鬥爭那樣簡單。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鬥爭是採取了這樣的公式：『德意志——德意志』，『意大利——意大利』，『日本——日本』。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要想到勝利，必須採取下面的公式：『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爲什麼？乃因爲前後的中國資產階級，牠爲歷史的等條件所限制，不能組成強大的力量，牠根本沒有反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意志與能力，——牠自身的階級利益連繫於帝國主義而反於工農，成了代帝國主義壓制摧殘工農民衆這一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偉大力量之工具，這便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所以只有鎮壓反日運動而不能領導反日運動之根本原因，也就是牠不能自解反日運動和反國民黨運動的連環性之根本原因。

孫中山所領導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在推翻清帝統治這一點，當然是革命的；然而整個的此次革命中，沒有一點反帝國主義運動和工農民衆解放運動，這兩大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特點，在當時的革命綱領中竟沒有一字提及，這就是那次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之反革命性，也正是那次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最初階段，國民黨爲了騙取蘇聯的幫助好打擊牠的政敵——北洋派，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地位，不得不打出反帝國主義和扶助工農的旗幟。北伐軍在勝利的半途，國民黨即露出其本來面

目，轉過鎗頭來屠殺工農民衆，向帝國主義投降。牠妄自以爲已經不需要工農民衆的力量，不需要蘇聯的幫助，牠自己已經有力量可以組織軍隊與政權；牠妄自以爲拿牠的反赤軍隊反赤政權的資格向帝國主義納降，必能獲得若干賜予。其實，在流產式的革命中，牠並未能組織成有力的軍隊與統一的政權，牠一離開工農民衆，一離開革命，立刻變成一個軟弱無能的東西，牠以和各派軍閥官僚妥協代替了革命的統一，以向帝國主義哀求談判代替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其結果，牠所遭遇的不是統一而是軍閥戰爭，不是帝國主義的讓步而是濟南慘案，萬寶山慘案，朝鮮華僑慘案，以至最近東北三省之佔領，熱河之進攻，天津青島福建之擾害和老西開之佔領。國民黨政府對於帝國主義這些不斷的暴行，照例是『不抵抗』，牠所最得意的政績，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廣州屠殺工人，在長沙屠殺農民，以至幾年以來，繼續在粵，桂，閩，湘，鄂，贛，豫，皖，等省屠殺爭取土地的農民，一直到最近的滔天大水災都阻止不了牠征剿農民軍，空前的日本暴行都阻止不了牠在上海廣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殺反日的市民與學生。

國民黨爲什麼這樣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同時又這樣瘋狂的屠殺民衆呢？這兩件事也有其必然的連環性：一切統治者，一切上層階級特別是他們的領袖們，第一天不相信民衆，第二天就要離開民衆，第三天就要害怕民衆，第四天就會仇視民衆以至屠殺民衆；牠既然離開了民衆，便不得不投降帝國主義，否則在空中一無所恃而不能生存了！投降了帝國主義，便不得不屠殺民衆，帝國主義不允許牠有中立之餘地。即最歡喜找中間道路而終於不會找着過

的汪精衛，最近也承認國民黨只有因宣戰而滅亡或因講和而賣國之兩途，既窮於中間道路之發明，所以只有不宣戰而賣國了。像這班寧可賣國以救黨的人們，不用說是『民族之叛逆』；就是一班號稱參加『抗日救國』運動的中等華人，奔走呼號『寧粵統一』『汪蔣胡團結』，也算是一『準叛逆』！這班『準叛逆』所奔走呼號的，不是救中國，而是救賣國的國民黨！

這班『準叛逆』，即不痴心妄想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至少也痴心妄想牠不在承認所謂五項基本原則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其實，這完全是『痴人說夢』！日本所謂五項基本原則，國民黨政府早已實行過了，或是在行動上答復過了，外交形式上的承認不承認有多大關係呢？

第一項，日本確保中國領土完整。南京政府曾請求日本濟南撤兵延緩以抵制馮玉祥；湖南湖北省政府曾請求日本炮艦轟擊長沙和黃石港的『赤匪』，這不是早已承認了日本有保障中國領土之義務嗎？

第二項，取締排日排貨及排日教育。『鎮靜』和『切實保護日僑』，國民黨政府早已三令五申；最近天津及福州，都已明令禁止反日運動；上海，廣州和湘潭，都鎗殺過反日民衆；上海法院懲罰過日貨檢查員；教育家竭力提倡『救國不忘讀書』，『埋頭讀書即是救國』，『科學是救國要圖』這些理論，甚至由學校通知學生家屬『如來校讀書，不准再作愛國運動』。（一月十五日申報本埠增刊），這不是根本剷除了排日教育嗎？

第三項，確保在中國日人居住營業旅行之自由。國

民黨政府既然三令五申『切實保護日僑』，這些所謂在中國之日人之自由，都已經不成問題，並且事實上，在上海的日本人且有聚衆示威之自由；在青島的日本人且有聚衆焚燬國民黨部和報館及放鎗示威之自由，事後，國民黨的市政府還向日本人道歉；在福州的日本人且有當學生開會時撕毀標語開鎗示威之權，同時因日人水戶夫婦二人被殺（自殺或暗殺尚不可知），國民黨的省政府對於日人各項要求：（一）將肇事學生送交日領署懲辦，（二）公開謝罪，（三）取締全省反日運動，（四）撤銷反日會及一切反日機關，（五）將全市反日標語全部洗刷，（六）賠償撫卹，已如何解決，謊爲『外交秘密未便發表。』而懸賞萬元購緝兇手，撫卹水戶夫婦四萬元，封禁東方新潮兩報和禁止反日運動，則是公開的事實。這不是確保日人之自由是什麼？

第四項，確認所得權利，履行條約。廢除不平等條約，本來是共黨的主張，國民黨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來，不止一次宣布遵守條約，牠只主張

由合法的外交程序請求修改，並不主張根本廢除；即最近否認所謂一九〇五年的中日密約十六條，也只是否認該密約之存在，而不是宣布廢除，那麼一旦日本政府證明其存在（如電通社十五日東京電日外務省所發表），國民黨政府怎麼辦呢？不用說是確認日本所得權利了。

第五項，保證南滿鐵路之安固。國民黨政府並沒有胆量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則一九〇五年的十六條和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都繼續有效，這不是充分保證了南滿鐵路之安固嗎？

所以，除了一班『進叛逆』以外，革命的民衆都早已認識國民黨政府根本是賣國政府，根本非推翻牠使不能反日不能救國。即令牠一時還不肯在外交形式上承認日本的五項基本原則，也只是一時遮掩這個事實，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所以，我再重複說一句，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

一月十七日

關外義勇軍英勇抗日的意義

南冠

當日帝國主義軍隊進攻遼吉之初，張學良以無抵抗主義而斷送遼吉，那時起而抗爭者只有馬占山一部份軍隊；此次日軍進奪錦州，張學良仍在堅持無抵抗主義之下，『未餉日軍一

彈，預先自動撤兵關內』，（見十二日申報記者通信），起而與日軍作殊死戰者只是關外各地的『義勇軍』。

據這一星期來報載的消息：在打通路沿線，北甯路沿線，南滿以至

安奉等沿線義勇軍到處屯集，與日軍作對，（見十二日國民社錦州電）。新立屯一役，日軍與五千義勇軍力戰，日軍全軍喪失殆盡，陣亡軍官四人。兵士至二千（十二日路透社瀋陽電）。並且打虎山曾一度被義勇軍第四路耿繼周部克服，日室師死傷達百數

十人，致潘錦間斷絕交通（申報北平十三日專電）。現在日帝國主義亦公然宣佈，東北軍無足慮，惟對義勇軍「散處各地，均感受亡省亡家之痛，不願隨東北軍退入關，決與作殊死戰……引以為深憂」（十二日國民社電）。

這裏有幅很明顯的畫圖：國民黨的張學良擁有三十餘萬正式軍隊，對日軍始終取無抵抗主義，遇日軍進攻始終是「未餉一彈，事先自動撤退」，現在且由關外退至灤州，平津，且有自動放棄熱河之勢（如湯玉麟的家屬便已全體遷平）。至於整個國民黨軍閥所領導的二百萬軍隊更是視若無觀。然而關外數量甚微的義勇軍，却始終採取頑強的抵抗態度，到處「決與作殊死戰」，最近拚命阻止日軍進攻熱河的又是義勇軍（申報十六日北平專電）。由這個畫圖表示出來：究竟什麼樣的武裝隊伍才能抵禦帝國主義軍隊的進攻，才能真正「抗日救國」，總算是十分明顯的了！

國民黨的軍隊何以始終堅持無抵抗主義呢？我們已屢次說過：國民黨所代表的只是中國上層資產階級的利

益，他們只能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取得幾分回扣，至於抵抗帝國主義他們是絕不會並且絕不能的。尤其國民黨的各派軍閥，爲了保持自己和平爭奪別派的地盤與對付反帝國主義的民衆起見，更是絕對不願犧牲自己的實力。（這次張學良之急急撤兵關內，爲對付馮閻奪取平津也是原因之一）換言之，國民黨的軍隊只是專用來作爭地爭城市之內戰和鎮壓屠殺民衆之任何反抗運動而已。這已然是有目共觀，普天下公認的事實了。

至於此次關外的義勇軍何以這樣勇敢地與日軍作殊死戰呢？據國民社的報告亦已說得十分明顯：他們是因爲「均感受亡省亡家之痛」，這證明義勇軍確含有民衆和民族的意識。他們決不像國民黨要人張學良等，亡了東三省還有平津，亡了平津還有其中國其他的地方，甚至亡了整個的中國，他們在國外銀行還存有千百萬的鉅款，還可以到巴黎，倫敦，紐約去作富家翁。享清福。然而我們東三省的民衆，亡了國，亡了省，亡了家，除了死，除了作亡國奴，受牛馬式的剝削和壓迫以外便沒有別的出路。所以非

與日帝國主義作殊死戰不可。因爲戰而敗亦不過死，不戰亦免不掉死，或者戰而勝，還者可以作中國民族的主人翁。

據申報記者十二日的通信說，義勇軍的組成份子，是民團，學生，退武軍人和「馬賊」等。據我們的推測，加入義勇軍的一定還有許多農民和失業工人。民團當然絕大多數是農民組成的。所以義勇軍大體說來是民衆的武裝。但這裏有兩個問題，何以在伍軍人不能與日作戰，退伍軍人反能敢與日作戰呢？何以「馬賊」也能抵抗日帝國主義呢？第一個問題是十分明顯的，中國正式軍隊之不抵抗日軍，並非士兵本身的罪過，而完全是由於長官，即國民黨軍閥所代表的階級根性和自私自利所致。假如中國二百萬軍隊完全脫離國民黨的軍閥指揮，由自己或民衆舉出軍事領袖來帶領，我們相信一定是能與帝國主義作殊死戰的（據報紙的通信記載。當瀋陽錦州等軍隊接到張學良的無抵抗命令撤退之時，有許多兵士和下級軍官痛哭失聲，誓願一死者，因此，有許多兵士和下級軍官自由投入義勇軍。）可以

挽救民族的危亡的。至「馬賊」之抵抗日軍，其原因也是由於受了環境和民衆的影響。並且所謂「馬賊」，其本身亦不過剛是失業的農民或久失業的流氓，這些份子固然會在某種環境之下可以爲上層階級甚至帝國主義利用，但在民衆勢力影響之下亦可以爲下層被剝削被壓迫的民衆效勞服務。且從這一事實中證明所謂「馬賊」比國民黨的正式軍隊還好得多呢。因此，我們相信現時湘鄂贛等省的農民武裝，即被統治階級所嚴勦的「赤匪」，如果能有機會與日軍對壘交鋒，其成績必然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最後，我們從此次關外義勇軍頑強抵抗日軍的事實中可得幾個重要的教訓：一，國民黨所指揮的軍隊是決不能抵抗帝國主義軍隊的，只有含有民衆和民族意識的民衆武裝才能與帝國主義軍隊作殊死戰。所以要「對日宣戰」則只有民衆迅速地自動武裝起來才有可能；二，要現時中國的正式軍隊對日作戰，則首先必須使現時的軍隊脫離國民黨任何軍人的羈絆，因此民衆必須鼓動士兵及下級軍官自動脫離國民黨軍閥的管轄，站在民衆方

面來；三，民衆的武裝應以城市工人和鄉村農民爲主體，因爲只有他們是最能堅決地反抗帝國主義到底的；四，最後要領導民衆武裝抗日，必須有統一和指揮全國民衆和民衆武裝的政治機關，在現時即必須首先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此次關外義勇軍英勇抵日的事實，已含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已給了我們重要的教訓。但這類義勇軍本身亦有幾個危險。就是：一，此類義勇軍還不由民衆的團體（如工人，農民和學生的組織等）有計劃地組織起來的，而是臨時雜湊的；二，缺乏有系統

哈爾濱白俄暴動與其幕後陰謀

復 初

自從東北軍退出錦州以後，整個東三省的版圖，除了哈爾濱和海倫一隅而外，現在通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蹂躪殆遍了。

至日本帝國主義者何以不馬上直接派兵進攻哈爾濱，這當然一方面因爲有蘇聯存在的關係，一時還沒有找到進兵的適當藉口；另一方面則因張景惠事實上已投降了他們，暫時還沒

的組織和統一的指揮；三，沒有明確主張；四，在某些方面還與張學良有多少關係。這些情形都足以使義勇軍難於有計劃地堅持與日軍作戰，甚至某些部份還有被張學良收買之可能。我們如果要使此類義勇軍走上真正代表民衆抵抗日軍到底，必須一方全國各民衆團體派有力份子到他們中去整理指導，尤其給他們以政治的指導；同時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民衆自動迅速也武裝起來，立刻召集緊急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去領導他們，集中一切物質力量去幫助他們。

一九三二，一，十七日

有直接出兵的必要。可是他們武力佔據哈爾濱的志願，幾時也不會放棄，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所以不肯放鬆哈爾濱彈丸之地，這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因爲在未來反蘇聯的戰爭中，哈爾濱有重要的軍事意義；第二，是因爲哈爾濱如果不直接放在他們的軍事管理之下，則恐怕蘇聯以哈爾濱以

及整個中東路為根據以作為幫助東三省革命羣衆組織抗日戰爭的策源地。使日帝國主義在滿洲的統治無時可以安枕——雖然蘇聯現在正忙着一國社會主義的建立，尚沒有餘暇顧及這一點，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這一層卻不能不時時惴惴於心，嚴加戒備。

因為有這兩層原因，所以哈爾濱雖然已經經過張景惠而落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手，但日本帝國主義仍嫌他的工具不那樣十分得力，亟欲直接去加以佈置。為達到這一目的起見，利用白俄的擾亂以作為進兵的口實，是再好沒有的計劃了。

這次哈爾濱白俄暴動事件，在不知內幕者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偶然原因所造成的偶然事件，殊不知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有系統的陰謀計劃之具體表現。雖然駐哈日領「堅不承認有主使白俄暴動之事」，但證之以經過情形則日帝國主義者之主動其間，已屬毫無疑義。十一日申報哈爾濱通訊，有如下的紀載：

「(一月二日下午)九時以後，暴徒演說愈烈，有主張即成立義勇軍請日領發給槍械者；有

呼自今日始俄人實行佔領中央大街者，種種怪異口號，不一而足。日領館館員一名，於十時許乘坐汽車一輛，通過阻斷交通處，一般白俄爭先開道，並呼日本帝國萬歲。日領館員亦故意示其帝國威勢，往返行經其地四次。」

在這一段簡短的新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大和魂和大斯拉夫帝國的游魂，如此親愛的擁抱在一起，是如何的別饒風味，同時從這些游魂口中，我們又知道了一重公開的秘密，原來他們已事先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允許，可以「請日領發給槍械」，而日領館館員之「往返行經其地四次」，自然不用說是為的要實地指揮他們，無怪乎「一般白俄爭先開道並呼日本帝國萬歲」了！

這一次事件出之日帝國主義的陰謀，已經是極顯明的事，所以申報十日所發表的通訊。其結尾有這樣的話：「此事微聞有日本之背景，蓋日方欲向哈埠進兵，正恐蘇聯阻止，故鼓動白俄作亂以為口實」。申報次日日的通訊則更補充說：「此事官方已得有確證，係日領館所唆使，每一暴徒

以金票二十五元僱來、憑票支取……」。除金錢收買的方法而外，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利用他們自己所辦的俄文時報以作為組織白俄暴動的機關。從這些地方看起來，誰能說此項白俄暴動係一種偶然事件而不是出之日本帝國主義有系統的陰謀計劃呢？

日本帝國主義這次在哈爾濱的陰謀與前此在天津的陰謀，固然同屬是進攻中國的毒辣計劃，但前者則更具有向蘇聯進攻的意義。因為哈爾濱的白俄的暴動，一方面固然可以作為他們直接進兵的藉口；另一方面則可以直接恐嚇蘇聯，若果蘇聯干涉他們進兵，則他們隨時可以把哈爾濱轉入蘇聯革命的直接死敵——白俄手中，這馬上便與蘇聯有很大的不利，特別是中東路的秩序馬上便會被白俄破壞。這時蘇聯將怎樣應付呢？直接出兵哈爾濱以消滅白俄嗎？結果誰也不能保證不致與日本直接衝突起來；而且日本帝國主義者那時亦可以藉蘇聯此舉以轉移中國民衆的視線；那時中國的反革命派自國民黨以至國家主義派亦必大喊赤色帝國主義，幫助日本帝國主義以掩飾其進攻中國的罪惡並以替

他們自己掩飾其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無恥投降。

哈爾濱的白俄暴動，現時自然只是在形式上暫時緩和下去，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未直接取得哈爾濱以前，這類的陰謀把戲自然是一刻也不會停止進行的。就蘇聯方面情形來說，它固然不宜和日本帝國主義輕啓戰禍，但亦不需要態度那樣過份的軟弱。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敢於肆無顧忌的想將他們的軍事勢力伸張到哈爾濱，正是因為蘇聯過份容忍的結果。比方當日軍活動越過中東路區域時，蘇聯如果採取強有力的干涉態度，則日本帝國主義多少是不能不有些顧忌的。現在哈爾濱事件發生，蘇聯方面索性連一次抗議也沒有，我們認為這種政策實

陶知行先生說：『外患之來是一個民族的惟一的試金石。』（一月十六日申報自由談）我以為可以而且應該再加上一句：對外民族鬥爭是一個民族中各階級層之最好的試金石。每個階級層，遲早都會自動的將牠的妥

在是太過於消極了。再就中國的革命民衆方面來說，我們對於此次日本帝國在哈爾濱的陰謀，應該有這樣深切的認識：即日本此舉不僅是想擴大其在滿洲的地域佔領；不僅是想預行鞏固其未來反蘇聯戰爭的障地；並且是想更進一步的遮斷蘇聯與中國革命民衆的關係。我們要打擊這種陰謀，要推翻這些強盜在中國的統治，只有與蘇聯攜手併進。黨國當局之所以始終不肯和蘇聯恢復邦交，這正是依照帝國主義列強的意旨，背叛了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與蘇聯恢復邦交並與之締結反帝國主義的堅固同盟。這一方針實是引導中國民族到自由獨立之路的主要條件之一。

擠他們到後台去！

頑石

協性或革命性在這一試金石上明白的顯露出來，一點也不會隱藏或保留。最上層必然是最妥協的階級層，在民族鬥爭一開始牠便是鬥爭進行的障礙物，如國民黨軍閥官僚大商資產階級等一切高等華人即屬於這一類。

此次的階級層，到了民族鬥爭一進展，他們中間的大部份，馬上表現動搖。他們的妥協性使他們只願意留在鬥爭的最初階段，而不敢前進，往往對於民族鬥爭的障礙物和前進份子之間採取中立態度。資產階級一時的向左盤旋的份子如上海市商會，上海市抗日救國會的領袖們，大學教授們，各大報的記者們，各省國難救濟會的政客們，都屬於這一類。他們是此次反日運動中之最右翼，他們唯一的武器是排貨和在報上發通電表示意見。他們對於賣國政府是採取希望態度，至多是責問態度，他們眼見賣國政府屠殺學生，而一聲不響，甚至勸告學生復課，勸告學生『躍出漩渦』，勸告學生『反動為靜』。他們的上海市抗日救國內部之渙散與腐敗，盡人皆知；可是他們一聞民衆主張改組，便發出公告說：『有少數份子非法開會，並有用民衆力量接收本市抗日救國會之主張，查本會係全市農工商學等合法團體所組織，並經報黨政機關備案在案，絕非少數一部份民衆所能任意破壞。』這一公告直是在民衆面前宣布這一『抗日救國會』是奉旨辦

理的官僚機關而不是民衆團體！牠口口聲聲自稱『合法』，罵人『非法』，其實牠自身也是一半非法。上海學聯會是無法團體嗎？是曾經備過案的嗎？上海總工會也是合法的嗎？國民黨的市政府會向南京政府報告牠『於法毫無根據』，南京政府也認爲『應查明設法制止，以維法紀』，我們忘記了，在賣國政府的壓迫之下，真的能鬥爭的民衆團體，永久是非法的，合法團體中，只能有官僚，不會有民衆呵！他們最得意的辦法是排貨，然而軟骨頭的抗日救國會不敢組織大規模的強有力的工人學生羣衆的檢查隊，眼看日貨充斥沒有辦法，眼看奸商屢次拒絕毆傷檢查員沒有辦法；並且此中有些份子爲了啟封日貨的主張達不到而辭職；這就是他們排貨的成績。此次反日運動如果不是從此消沉下去，如果還會向前發展，這班不願前進而願意留在運動之最初階段的妥協份子，必然會被前進份子擠到鬥爭的後台去；同時也必須把他們擠到後台去，反日鬥爭才能向前發展！

再其次，小資階級的上層份子，如學生會的大小領袖們和工會的官僚

們，他們較之上述最右翼的份子，算是前進的。他們（學生）曾參加了反賣國政府的流血鬥爭，他們（工會領袖）曾不顧什麼合法與非法改組了一些工會，雖然他們在反政府鬥爭中取了不少的妥協態度和溫和政策，甚至有的少數領袖腐化了，雖然在大會改組中仍然取了上層份子包辦的政策。可是他們的妥協性與不徹底性，已隨着鬥爭的發展而顯露出來。十四日的上海各界聯席會議，原定市農會五人，總工會代表五人，市商會代表五人，各大學抗日聯會代表五人，各中學抗日聯會代表五人，一共二一五人的巨頭會議，嗣見到曾參加者至有工人學生民衆二百餘團體，代表三百餘人之多，竟由大中學抗日聯會通告『今日聯席會議因出席人數不足法定，宣告流會』，抗日救國運動是應該只由少數巨頭包辦的嗎？各界聯席會議爲什麼不歡迎民衆團體代表參加而拒絕他們呢？特別是大中學抗日聯會的代表們，他們昨天還遭了陳銘樞蔡元培的白眼與刺刀，今天就想效法陳銘樞蔡元培的架子來對待民衆，未免太早了一點吧！各大學學生抗日聯會，拒絕

民衆代表時是一副面孔，對國民黨要人却另是一副面孔，電請汪胡蔣『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杭州學生代表們，全大學生代表們，更是奔馳奉化，上海，香港，哀求蔣汪胡『晉京主持黨國大政』——賣國和屠殺民衆的大政。他們殺你們還沒有殺夠嗎？中央日報門前的血已經乾了嗎？這班學生已站在保守與前進的分水界，反日鬥爭如果再向前發展，他們當中的許多落後份子，必然要成爲此次運動中的右翼，必然會被更前進的份子擠到鬥爭的後台去。

依一般鬥爭發展的規律，只要鬥爭大潮不是低落而是高漲，則鬥爭中的各階級層各派別以及其各個份子，比較不堅決的右傾妥協者，都要一層層被堅決的前進者擠到鬥爭的後台去，各國革命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史，曾充分說明了這一鬥爭發展的規律，所以我認爲在此次反日鬥爭中所謂『一致對外』，應當要求與前進份子一致，使鬥爭大潮向上高漲；而不應當要求與落後份子一致，使反日運動向下低落！

最後，工人貧農及一切勞苦民

衆，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他們的階級利益和中國民族解放根本上是一致的；並且也只有他們衝上反日鬥爭

上海商人對於罷市的態度

南冠

的前線，才能夠走到中國民族解放之完成，徹底的完成。

一月十八日

自上海市各大學及中學抗日救國會請求上海市商會，下令商店罷市促政府出兵對日以來，這一個多星期內從市商會，各同業公會以及各路商聯總會對此問題所表示的態度中，亦很可以看出中國資產階級對「抗日救國」之一般態度。

上海市商會接到學生的罷市請求之後，即用一種外交手段將責任委之於各同業公會以敷衍學生，即表面上徵求各同業公會的意見，暗地裏派人至各同業公會令其表示反對，結果，各同業公會果然「對於舉行罷市一節不能同意」（十六日申報）。而所謂較「左」的各路商聯總會呢？則「以內政未上軌道，外交決無辦法，以救國救民自負之國民黨政府各領袖間，同黨異策，散盡四方，置國難於不顧，即使罷市，……於暴日更其不能損其毫末……」等理由而反對罷市。這

樣一來，幾日來上海喧囂一時的罷市問題就算「解決」了！

本來，當此整個滿洲已經斷送。

日軍還要進取熱河內蒙和平津，同時國民黨政府繼續堅持無抵抗主義，并企圖與日談判投降條件之時，爲反抗日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不僅全國工農學商罷工罷稅罷學罷市爲絕對需要，即自動武裝起來直接抵抗暴日，自動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領導民衆對日宣戰，亦是絕對需要的。然而上海的資產階級卻認爲罷市是「無謂的犧牲」！不錯，罷工，罷學，罷市：都是要「犧牲」的。但日帝國主義奪取了整個的滿洲，滿洲幾千萬人民的生命財產都在日帝國主義自由踐踏之下，這不算「犧牲嗎」？如果日帝國主義進而奪取關內的城市，甚至聯合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瓜分全中國，使中國淪爲完全的殖民地，（這在堅持

無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是可能的），那時「犧牲」又將怎樣呢？犧牲目前的小利益（罷幾天市，不過少賺幾個錢，而且就整個的市場上看來銷費貨物還是一樣的，罷幾天市之後，買貨者一定增加，結果賺錢未必一定減少）以爭得全民族的大利益，這難道不是應該的嗎？資產階級平常尤其在「國難」中總是對工人說：「你們應爲全民族的利益而犧牲」，然而偶一觸到有損害於他們自己的徵收利益時（如罷幾天市）便立刻表示反對。這樣，資產階級簡直等於對於工人店員們說：你們應餓着肚子一天作十六點鐘的工，爲我們多造些剩餘價值，多增些利潤。因爲增加我們的利益就是增加全民衆的利益，現在罷市是有損於我們的利益的，這就無異於損害了全民族的利益。這一秘訣。大概就是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罷！

商聯總會甚至公然說：「商人愛（？）國，何敢後人，往時五卅慘案。罷市多至二十七天。其與帝國主義奮鬥，而具大無畏（？）精神……」，這真是事實嗎？其實當五卅慘案發

生了三四天，上海全體學生已經罷了課，全體工人已經罷了工，而上海的商人們，還是毫無動靜；迄至學生們，工人們跑到總商會和各界馬路聯合會要求罷市時，商人們的領袖還是百般推諉；直到工人和學生忍無可忍，羣趨總商會逼令其下令罷市時，當時代理總商會的會長方椒伯及一般商人領袖們還是猶移不定；最後學生和工人表示異常憤慨，聲言如總商會不下令罷市，即不許總商會領袖們出會門一步，這樣一來才迫得方椒伯勉強當面把罷市的命令發下來。但罷市不到幾天之後，虞恰卿王曉賴與一班商會領袖立即主張復市，後來經過上海總工會和上海學聯多次抗爭，才又勉強延長了幾天。至於工人們餓着肚子罷工一直延長兩三個月，有些延長至四五月之久（香港的工人罷工延長至二十八個月），而且最後還是虞恰卿一班商人盡力破壞，壓迫，才勉強上工的。這種事實，只要每個當時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的人想都能記憶。現在商聯總會竟居然大表五卅時上海商人如何『與帝國主義奮鬥，向具大無畏的精神』，真是無恥已極！

我們檢閱眼前的事實，更是明顯。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上海市商會所包辦把持的『抗日救國會』即對於檢查日貨也完全採取怠工的態度，虞恰卿王曉賴一班商人領袖們唯恐學生工人自己起來檢查日貨，他們表面上便不得不裝出要如何嚴厲禁止日貨，然而暗地裏卻處處袒護日貨商人，甚至公然主張開放日貨。到最近，『抗日救國會』的工作，就連市商會以『經濟絕交委員會』也不能不承認完全『停頓』了（見十六日申報本埠欄），日貨是公開發賣了。至於他們對於工人却以『增加生產救國』的口號去加緊剝削他們，剝削之不足還要加以各種非理的壓迫，不許工人組織抗日救國會，不許游街示威，無故開除，甚至屠殺等。這些情形真是『商人愛國何敢後人』的寫真！

顯然的，資產階級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之下，他們都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他們是決不願擔任任何犧牲的。所以代表他們的國民黨政府之堅持無抵抗主義，甘心賣國，決不是偶然的。他們雖然有時也埋怨他們的代表，他們的政府太無用，『政治未上軌

道，外交絕無辦法。……國民黨政府各領袖，同黨異策，散盡四方，置國難於不顧……』，然而他們自己又有甚麼辦法呢？他們連罷市的小小犧牲都不願。所以最後，他們還只有希望他們的領袖（蔣汪胡）『合作』他們的政府決定辦法，但他們的政府却眼巴巴地始終望着國聯和美國，來拯救他們。『愈到東方資產階級愈是卑鄙無能』，我們還能希望他們『抗日救國』嗎？

上海的學生請求市商會下令罷市，這本來就是不識時務的幻想。至希望以罷市，罷工，罷課來『促政府出兵對日』，更是痴愚。上海的商人能够自動罷市嗎？國民黨商人王曉賴們所把持的市商會能夠下令罷市嗎？商人罷市只有在工人店員學生羣衆威脅逼迫之下才有可能。如果真要上海罷市，只有學生和工人羣衆到各商店去喚醒店員，以羣衆的力量去壓迫市商會和商聯總會，（這正是五卅時學生工人對商人罷市所採取的有效辦法），或者有多少希望，此外是沒有可能的。當然，上海的資產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罷市的，譬如最近爲了

停付公債本息。上海市商會和銀業便有蘊釀罷市之舉。現在的學生如果真要抗日救國，就應該堅決地跑到工人

公債？

還債真是神聖的義務嗎？即令是神聖的，「公債公還」，「私債私了」，總應該是這樣吧！

以前北方的金融資本家——北洋派的走狗，勾結財政當局，以內債的名義盤剝國庫，一方面軍閥的荷包裝滿了，一方面銀行家的財產也增加了。所苦者只是歷年拿血汗填補國庫的人民！

國民黨遷都南京以前，北方銀行家這筆大買賣為東南銀行家——蔣介石走狗所攘奪，這也是歷年南北戰爭的動因之一。

國民黨在南京稱王稱霸四五年，發行了公債十餘萬萬，除了以人民血汗還過三四萬萬元，未還的現在尚有七八萬萬元，其數量遠遠超過北洋派十餘年所搜刮的以上。

國民黨政府發行了這許許多多公債，辦了些什麼事呢？所謂「裁兵」

和農民中去，那裏才是真能「抗日救國」的力量啊！

一九三二，一月十六日

蔣公

「編遣」「整理金融」「救災」，一樣也沒有做，大部份自然是用做蔣介石討桂，討張，討唐，討馮閣的軍費，其次是進了蔣介石宋子文以下各要人的荷包（盡人皆知的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書生，現在莫不腰纏百萬數十萬元），再其次用做他們的黨部的經費，再其次用做收買非蔣系的將領和豢養鷹犬，現在只要舉出兩個小數目便已驚人：逮捕一個鄧演達即花了三十萬元，蔣介石買一架自用飛機也花了二十八萬元。

東南的金融資本家——蔣介石的走狗，經過蔣狗虞洽卿王曉籟等，勾結宋子文，以公債的名義，供給蔣介石這樣鉅量的揮霍，蔣介石能够放胆作惡，是恃有在他背後的兩大靠山：第一要算是為他籌款的走狗——上海銀錢兩界，第二才算是他的嫡系軍隊，蔣介石所恃的這兩大靠山不崩潰，

蔣介石的地位（無論在朝或下野）是不會改變的，他的作惡也是不會停止的。

蔣介石在表面上宣告下野後，一方面以九省聯防和東北的武力圍困孫科政府，一方面嗾使他的走狗——上海銀錢兩界對孫科政府加以財政的封鎖（胡漢民曾以蔣派這樣的大包圍計劃勸汪精衛不可冒昧進京），弄得孫科走途無路，才不得不放胆說了兩句大話，「九省督軍免職」和「停付公債本息」。來嚇嚇蔣派。

蔣介石也恐怕孫科真會挺而走險，於是一面由何應欽何成濬先後聲明九省聯防之非實，一面自己到杭州敷衍汪精衛一下。同時，銀錢兩界的蔣狗也向孫科讓步，應允擔任五百萬到七百萬元，孫科並沒真會停付公債本息的胆量，只要蔣狗解除財政的封鎖，所以也就取消停付之議。

此次所謂「公債」，照牠的用途，當然只是私債，蔣狗們——上海銀錢兩界借給蔣介石且以助他作惡的私債，決不是什麼公債。人民應該根本否認，即永遠不付本息，而不能如孫科所主張的什麼限期暫行停付。人

民對蔣狗們這一點輕微的懲戒是必須的。蔣狗們所呼喊的『此七八萬萬元之債券，散在民間，不啻七八萬萬元之財產。一旦失其效用，無異全國人民破產』，『不啻將全國人民歷年置備之財產，宣告沒收』，（執券人會宣言）『人民執有一紙債券，大都與田單房契同視，賴為終歲事蓄之需，……以資度日』，（市商會呈國府電）『其仰賴於上項債券本息者，幾遍全民，一旦基礎動搖，……致陷全民於破產』，（銀錢業上國府電）『本人對於關係國信民生之大問題，不容坐視。……此非僅關係於社團平民孤兒寡婦生活源泉之保障，且為國本所繫，故不惜任何犧牲，務力求其鞏固』。簡直是彌天的大謊！

他們這些呼喊，即便喊破了喉嚨，也無人會受其欺騙！此項債券大部

份是儲在各銀行金庫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金，他們自己常常在報上公布過，難道人民都是瞎子嗎？有一部份流轉於交易所和投機商人手中，中產以下的人，持有此項債券者甚少。所謂『人民破產』『全民破產』『國信民生』『國本所繫』，只是危言聳聽而已，假『人民』『全民』的名義擁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慣技而已！如果他們真是關心『國信民生』，關心『人民破產』，關心平民『賴為終歲事蓄之需，以資度日』，關心『平民孤兒寡婦生活源泉之保障。』何以無數勞苦平民因黃楚九的日夜銀行及大世界儲蓄部之倒閉而啼飢號寒痛哭無告者，他們何以置之不理！難道只有銀行家，交易所，投機商人才是人民嗎？難道這班人即是全民嗎？

退一萬步說，即全停付公債（？）

（本息有害金融，甚至影響一部份中小商人的財產而應該償還，也只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等黨國要人的私產，並沒收虞洽卿王曉籟及銀錢兩界一班蔣狗的私產來償還，『私債私了』，這是公道的辦法，決不應該用人民血汗所納的租稅來償付此項所謂『公債』的本息！

這班蔣狗的金融資本家，這班資產階級的英雄，眼見日本侵佔東北三省，氣吞全中國，一概不關他們的痛癢，獨至一說停止公債（？）本息，稍稍侵犯了他們的財產，便羣起大呼救命！他們都是『猶太人』吧！『只要有錢，不怕亡國』！主張民族革命不要階級鬥爭的人們，不知對此作何感想！

一月十八日

時事短評

妙高台上的中國政府！

汪精衛很堅決的主張『組織政府之權屬於中國國民

黨』，現在他們甯粵統一了，新政府果然仍舊由中國國民黨組織起來了，然而他們政府的三個主腦即中政會全體常務委員，一個跑到奉化的妙高台，在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之外遣兵調將；一個躲在香港的妙高台裝病，在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之外組織西南五省聯盟；一個雖然心中熱於登台，而眼見兩個妙高台不能合作，現象實在不高不妙，也不敢

一人貿然上任；因此使孫太子不得不大喊『中樞空虛諸事停滯』（孫科致唐紹儀等電語），因此使一班黨國次等要人如孫科居正于右任等，不得不走馬燈似的分途到奉化香港拉人。孫科宣稱如蔣汪胡不赴京他也要辭職，于是南京方面又慌着派陳友仁來上海拉孫科回去。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組織政府的成績，也就是他們『精誠團結』和『共赴國難』的成績！他們還有掌握政權的資格嗎？然而他們還是堅持着中國四萬萬阿斗只有由他們來訓政的資格！

『仁者』即是醜類！

馮玉祥最近在上海在一幅人力車夫圖上題了一首詩：『一人坐車一人拉，同是人類有牛馬，重重壓迫真痛苦，唯盼仁者來救他』。勞苦羣衆只有奮起自救，並且也只有他們奮起自救的這一偉大力量才能救救普天之下的人；一切寄生蟲都應該革面洗心的來替他們服務。若有什麼『仁者』不自度德量力的胡說『來救他』，正是他要打殺的醜類！這班醜類『仁者』的思想，正是孫中山視四萬萬人民爲阿斗和主張國民黨訓政這一反民主的思想之來源！

『國人』是什麼？

吳鐵城說：『現在國事緊急，國人一致希望胡汪蔣三氏共出維持大局，蔣先生前曾表示個人進退，以全國人士之意志爲依歸，故值此時際，蔣先生定能應國人一致之需要，命駕來京』，吳鐵城心目中所謂『國人一致』的『國人』是些什麼人呢？即令是指黨國的『國人』，也很明顯的大大的不一致；至於中華民國的國人，更是一致希望他

們永住妙高台和永遠真的或假的『養痾』！死了更好！

嗚呼條約與賠款之莊嚴權利！

法蘭西政府，一聞德國政府將要求取締賠款，即宣言：法人決不容德國取締凡爾賽和約與破壞賠款之莊嚴權利。然而被壓迫的德國人，非取『越軌行動』以撕碎凡爾賽和約與破壞賠款之莊嚴權利則無以自救。德國政府如果不向法國取這樣的『越軌行動』，則德國人民必然要取『越軌行動』對待他們本國的賣國政府。或是亡國，或是取『越軌行動』，二者之間，德國人民必取其一。

統治者眼中的合法與非法

英帝國主義的所謂印度政府，大捕全印大會著名領袖四十餘人，宣布全印大會及聯合機關均屬非法。當全印大會派遣代表出席倫敦圓桌會議，表示和英帝國妥協時，全印大會便是合法機關；現在反抗牠時，便是非法了；這就是統治者合法與非法的解釋。

『非武力抵抗』與『不抵抗』

甘地所領導的印度國民黨，對英國取『非武力抵抗主義』，已經不算革命的集團了。中國的國民黨，更索性對日本取了『不抵抗主義』，牠是什麼集團呢？

大商資產階級的國際性

全印大會主張抵制英貨，但許多商人仍向英國定貨，棉業公會亦未能決議抵制外布。全印大會提議抵制歐人商

行和停止與利物浦交易所往來，只有許多小商人力逼取此行動，其他小麥種籽疋頭公會及大條交易所等，均以棉業公會之行動為趨向。這是證明了一切民族中的大商資產階級都與帝國主義的利害一致，他們都是破壞愛國運動的亡國奴！

統治者眼中的犯罪與不犯罪

據申報十日南京電：『大農學院學生會廣墀，因有北平抗日救國聯合會控其散發共產傳單，未准保釋』。哼！散發共產傳單就是犯了罪，但同電又說：『在押之會廣墀正由北平各救國團體聯合會代表孫松泉營救中，並申述北平並無抗日救國聯合會。』那末，假借抗日救國聯合會名義誣控會廣墀的人，大概不算是犯了罪吧！

請看乘火打劫的資本家之增加生產！

自抵制日貨後，國貨紗布銷行甚廣，惟乘火打劫的資本家，拼命增加價格以圖厚利，在未抵制前，每疋以六兩餘標價者，現在漲至九兩餘，因此日商得有機會仍舊以五六兩價格直接推銷內地，於是內地惟利是圖的好商，見日貨比國貨每疋便宜至三兩有餘之鉅，紛紛秘向日商購買，如潮之湧，莫可制止，因此上海各日廠遂宣告『日有起色』了！這班乘火打劫的資本家，他們自己是發財了，排貨運動是被他們破壞了；然而他們還口口聲聲用什麼『勞資雙方相忍為國』『增加生產』的名義來無厭的無恥的剝削壓迫工人！

反蔣與迎蔣

昨天標榜所謂『民主政治』旗幟來反蔣的汪精衛孫科一班人，好像是丈六金身的巨人；今天一變而有跪在蔣介石面前不足一尺長的矮鬼，我想蔣皇帝一定提起他一向微笑而冷酷的面孔說：你們這班怕老婆的偽君子和小阿斗，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汪精衛孫科這班民主主義（？）者，既不願絕對服從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又害怕革命的民衆勢力如蛇蝎，他們兩腳站在空中，安得不昨天還罵着反蔣今天便笑着迎蔣！

張知本的不兌現支票

張知本等在野時所發表的九條提案，一在朝便拋在毛廁中去了。並且九條提案中，曾主張『人民的自由組織團體或政黨』，現在張知本老爺做了中央民運指委會主任，馬上便大答其官腔說：『民衆團體之組織，暫以現行法令為依據，法令未盡美者，須經合法修正後，始得變更其組織』。這樣一來，人民組織團體，必須依據政府的法令，而且還要依據蔣介石政府所頒布的現行法令，則所謂人民組織團體之自由，已剝奪得一乾二淨！並且，最近上海工商學各界所自由變更的組織，照張知本老爺的辦法，都須一一依據蔣的法令，恢復原狀；那麼，張知本等的黨籍，也要依照蔣的黨令恢復原狀才對呀！自己發出的支票，自己當面不兌現，未免臉皮太厚了吧！

林森也居然有了將相！

國府文官長魏懷參軍長呂超，重行宣誓就職時，監誓的中委褚民誼致訓詞說：『文參兩長有如帝玉時代之將

相」。褚民誼這句話，若用在蔣皇帝時代，或者還有點像，現在施之於可憐的林森，未免太過揶揄他了！

小小的罪狀

外次甘介候對各報記者說：「駐外使領官，現派定三十餘人，但經費浩大，值此國庫支絀，無法籌措，最近仍不克啟程」。然而南京政府及中央黨部在上海所設對付敵黨的密探機關多處，大者每月經常費十餘萬元，最小的每月也有一萬元，捕了一個向忠發，又特別花去三萬元，捕了一個鄧演達，又特別花去三十萬元；這樣就不國庫支絀了嗎？蔣介石向美國購買自用西哥斯基式飛機一架，價銀二十八萬元，所雇駕駛之美國人，月薪一千五百美金；這樣就有法籌措了嗎？我們不必大驚小怪，這不過他們的罪狀之一小小部分！

人民的錢是不容易到手的呀！

馮玉祥大罵張學良不抵抗，他自己真打算抵抗嗎？至多不過說說『備戰』而已！人民所以踴躍捐助馬占山，是因為他小小的抵抗了一下，做了矮人國的長子。張發奎住在上海叫了一陣北上援馬，沒有騙到人民一個錢，人民是要看事實的呀！馮玉祥如果真能（？）率領軍隊到山海關外和日本軍隊拼命，人民當然會和援助馬占山一樣援助他，可是跑到上海說說大話，人民是不會拿出一個錢來的呀！尤其是黨國的將軍們，人民蒙他們的欺騙蹂躪已經够受了，無論什麼金字招牌，已經沒有一點信用了！

陶知行的半真理

陶知行先生說：「蔣君介石說『攘外必先安內』，孫君哲生說『救國必先救黨』，我的見解恰恰與蔣孫二君相反：『安內必先禦外；救黨必先救國。』」他這幾句話只道着了一半真理；其餘的一半真理是：『要禦外侮同時必除內奸；救國需要一個真能領導民衆救國的黨』。

左的詞句而已

在國民黨許多個人中，宋慶齡算是最左的了；然而她仍然認爲『其實三民主義何嘗一日見諸實行』。在國民黨的許多報紙中，上海日報算是最左的了；然而牠仍然『承認三民主義有救國之可能性，仍許國民黨以黨治國』。凡是根本認識不清的人，雖然有時會因環境或一時感情衝動的關係說出一些左的詞句，而詞句終於是詞句而已。

無形瓜分中國快要開幕了！

日軍攻下錦州後，親日派（陳友仁與幣原及芳澤的關係，居正與萱野的關係，以至整個的國民黨和牠的老友犬養內閣的關係，）的南京新政府直接交涉政策已躍躍欲試後，美國史汀生馬上商之英法意各國大使，首先照會中日兩國，一再聲明『不欲承認中日政府或中日政府之代理者所訂任何條約或協定，而妨礙美國或在華美僑所享之條約權利』，『美政府不欲承認任何協定足以妨礙美國及其他人民所享條約權利之有關於對華國際政策，即普通稱爲門戶開放政策者』，其他帝國主義當然接着就要發出同樣的照會。很明顯的，各帝國主義也既不願得罪日本，又不願日本獨得中國這塊肥肉，只有羣起向中國要求分給他們一杯羹。這一照會，除了表示國際帝國主義無形瓜分中國之企圖快要開幕外，還有其他意義嗎！

12540
44399